



论当代文学的 民间资源

—— 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为个案

宋 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当代文学的 民间资源

——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为个案

宋 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当代文学的民间资源 / 宋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004 - 9275 - 7

I. ①论… II. ①宋… III. ①当代文学: 民间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7904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成 树

责任校对 张 青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刘大杰先生论及《诗经》、《楚辞》差异时说：“我们读完了《诗经》，再读读《楚辞》，你立刻会感到置身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我们日常接触的现实社会，一个是富于幻想的神秘森林，不仅人的思想情感如此，神的思想情感也是如此。至如双方所用的文字无论形式、修辞及音调方面，都非常适合于这两个不同的世界的表现，使这两个世界的色彩格外分明。我们要说明《楚辞》这种特异性的成因，若仅赖于作者的天才与个性这类抽象解释是不够的。我们必得要从地域宗教和音乐各方面，去追求根源，才可获得圆满的解答。”细考中国文学发展史脉络，这结论完全可推及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尤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解读、体会作品的新途径：将文学创作者的个人才华和融渗于作品中的民间文化因素（如地域、宗教、音乐等）结合起来，在更宏阔的背景下理解作家的思想、情感，把握作品的形式、风格和艺术特色。

民间文化驳杂繁复，地域不同，形式便不同，其象征意义更不同，作家之所以将民间文化因素引入作品，其主观原因大抵基于审美需要，至少起初如此！作为文学研究，我们所要追寻的目标不应仅局限于这一层面的意义，而是隐藏在主观目的幕后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必然是浓缩了作家主观特性的客观存在。如此，这种研究一方面显得很有生趣、甚至充满了诗情画意，另一方面，如果选题稍有不慎、或论述不能严格控制，很可能成为大而无当的闲话、或走马看花式的浮视。本书之所以选择贾平凹，首先，他以乡土写作知名，他的最重要的作品都深深地扎根在民间文化极其深厚的土壤中；其次，他有他的商州，那里有他

的山川、溪流，有他的民谣、俚曲，有他对时令、婚嫁、生死等周而复始的现象的理解和固定仪式，有他幽幽的鬼魂、飞舞的精灵，有他的月亮和月光下影影绰绰的人与事及抹不掉的记忆，这一切都是他的，非他莫属！

研究重点探讨了三方面内容：一、社会民俗。村落家族文化体现着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是研究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透视角。对当代村落家族文化的变迁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人情，从而为中国当前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二、信仰民俗。只有深入考察民众们的宗教文化信仰，才有可能达到对该地区历史文化传统演变、民众心理进行较深层次的阐释与把握。三、多种民俗——信仰民俗、社会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等的综合体现。性文化在当代作家们的笔下得到了突出地描写和强调，贾平凹因着意于呈现生活的原汁原味，因而更是将其当成一种必不可少的点缀甚至是公开的招牌。在这些民俗文化中，潜隐了广大民众的人生哲学与处世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有着“元哲学”价值，为我们探寻民众的文化性格、精神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研究一个作家，当然是研究他的独特性，与其他作家的差异所在，差异根植于共性，因此，研究特异性的同时，共性一目了然。

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从两方面扩展其深度和广度，其一，扩展文本，如新历史主义及形象学等；其二，引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成果及理论。本书不揣冒昧，试图将两种研究趋势结合，采用“民俗学”方法研究文学作品，运用“文化人类学”、“文献民俗学”等方法研究作家，再辅以与文本关系较远的相关资料，以期达到通过贾平凹这个个案而在更大程度上探讨民间文化与现当代中国文学关系问题的目的，但限于研究者的才力学力，很多地方尚未深入开掘，这一定会成为研究者日后的努力方向。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世纪末民间文化热潮的掀起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选取和研究角度的切入	(3)
第三节 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14)
一 民俗文化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	(15)
二 民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意义及启示	(25)
第一章 当代村落家族文化的变迁	(41)
第一节 乡村文化结构的转化：血缘家族权威向行政 权威的转变	(45)
一 “乡约族规”时代向法理体制时代的转变	(49)
二 血缘家族权威与社会行政权威的交叉互渗	(54)
三 当代村落家族文化中的新景观	(55)
第二节 土地崇拜向金钱崇拜的转变	(59)
一 安土重迁——背井离乡	(59)
二 民风醇厚——人情淡薄	(64)
第三节 宗族教化的难以为继	(69)
一 “孝亲”文化的今昔对比	(70)
二 “丧葬仪式”的今昔对比	(74)
三 “聚吃”文化的今昔对比	(76)
第四节 集体人格向个体人格的转变	(78)
一 婚恋观的转变	(79)

二	冒险精神的萌发	(81)
三	居住结构的改变	(81)
四	个体人格的两面性	(82)
第二章	贾平凹作品中的民间宗教信仰世界	(85)
第一节	贾平凹与民间宗教信仰世界结缘的原因	(87)
一	独特的地理环境	(89)
二	自身的情趣所在	(90)
三	疾病的影响	(91)
第二节	贾平凹作品中的民俗信仰	(93)
一	贾平凹作品中的巫术文化现象	(93)
二	民俗禁忌种种	(100)
三	民间术数种种——卜卦、测字	(102)
第三节	贾平凹作品中的民间宗教世界	(105)
一	贾平凹作品中的民间道教文化	(106)
二	贾平凹作品中的佛教文化世界	(112)
三	民间宗教信仰的杂糅与融通	(122)
第四节	商州丧葬习俗中的民间宗教文化	(134)
一	商州丧葬习俗中所包蕴的巫术、民间道教 文化现象	(136)
二	佛教文化对商州丧葬习俗的渗入	(137)
三	儒家文化在商州丧葬习俗中的反映	(138)
第五节	民间宗教信仰杂糅与融通的典型载体 ——目连戏	(140)
第三章	贾平凹与民间性文化	(144)
第一节	真实的民间世界	(145)
一	“下里巴人”的狂放不羁	(146)

二 俗中有雅与雅中有俗	(149)
第二节 民间的性崇拜	(154)
一 “生殖器崇拜”的古与今	(156)
二 “性交崇拜”的古与今	(160)
三 生育崇拜	(166)
第三节 性禁锢与人性的冲突	(174)
一 “存天理,灭人欲”旗帜笼罩下的男人 与女人	(175)
二 贾平凹作品中僧尼、道士的“性化” 现象	(177)
第四节 富有民间情趣的性意象	(186)
第四章 民间原型的重构与再造	(193)
第一节 人物原型	(195)
一 “弃妇”原型:牛月清、白雪、菊娃、颜铭等	(195)
二 圣女原型:小水、小月、满儿、月儿等	(203)
三 荡妇原型:唐宛儿、柳月、邹云、苏红、 白娥、陆翠翠等	(209)
四 “漂泊者”原型:庄之蝶、高子路、 夏风、夜郎、金狗等	(217)
第二节 情节原型	(228)
一 循环原型	(228)
二 “乱伦”原型的置换变形	(235)
三 民间征兆原型	(240)
第五章 民俗文化与现代性	(244)
第一节 民俗文化与现代性的精神契合	(245)
一 对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	(248)

二	对人类诗意化生存方式的回顾与眷恋	(258)
三	审美意义上的现代性品格	(263)
第二节	民俗文化的“抚慰”机能	
——	民众的心理寄托和精神安慰	(266)
第三节	民俗文化的现代转型	
——	共生共荣, 协调发展	(269)
参考文献		(276)
后记		(281)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世纪末 民间文化热潮的掀起

20 世纪末以来，当代文坛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浓厚的民间情怀。作家纷纷放弃启蒙立场、拒绝崇高，将专注的目光投射到对百姓世俗化的民间生存本相的描摹与刻画、展现他们的生存困境及其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上。总体而言，其创作体现出一种平民化特色。这一文化立场的选择与其说是出于作家们的自觉意识，还不如说是出于无奈。他们带着对文学的迷茫与困惑，转而回望“民间”，渴望着能依靠这块广袤的美学园地来拯救文学，也拯救自己。“于是，随着作家创作立场的调整，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发生了新的裂变与组合。一批新写实作家视点下移，平稳地向民间过渡，一些先锋派作家在遭到读者拒绝后也开始回归大众，及时地作出策略性转移，还有一部分作家，则沉溺在历史的废墟上超度亡灵，企图穿越漫长的时空唤起民间的回应。总之，作家们在脱离庙堂与广场之后，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归隐民间，通过平民的眼光对民间生活做出新的发现”，^① 随之出现了大量优秀之作：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张炜的

^① 宗元：《走向民间：对当代文学的一种现象描述》，《小说评论》2001 年第 3 期。

《家族》、《九月寓言》，李贯通的《天缺一角》，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有余华、杨争光、李锐等无不对民间文化表现出强烈关注。可见，对民间文化的突出描写无疑已成为当代文坛的新景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在面临着一场全面而深入地变革，其总体格局是向开放、多元化方向发展。文学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也进一步走向多元化、多向度。与此同时，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关于文学的“边缘化”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文学逐渐被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冲击到生活的边缘地带，文学家们也不再以启蒙者或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自居。社会地位的下降给他们带来了无法言说的失落感，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进一步将他们推入尴尬境地。面对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作家们开始走向民间，用自己的身心去拥抱民间，以此作为对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一种无言的反抗。

勃兰兑斯在对 19 世纪前半叶英国文学的发展进行研究时曾指出，文学现象的出现与同时期社会上流行的思想倾向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普遍的，因为产生它们的根源是普遍存在的”，“为了救亡图存，所有遭受威胁的民族，或是本能地或是有意识地，都在从本民族的生活源泉中汲取使自身重新振作起来的活力”，“爱国热情导致各个民族都热切地研究起它们自己的历史和风俗、它们自己的神话和民间传说”。^①事实上，我们可以将世纪末民俗文化热潮的掀起看作是文化意义上的“救亡图存”。政治和学术精英们的现代性诉求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一切，民间的历史创造和记忆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在这一情境之下，文学界试图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就具有了极其深刻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寻根文学”思潮的延续与深化。80 年代

① [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徐式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 页。

中期曾掀起“回归传统”浪潮的寻根文学对于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并非保守自闭、故步自封，而是试图借助于更原始、更深层的“传统”来探寻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可行性途径。寻“根”的意图也得益于西方文艺热潮的影响与启发——维柯的原始历史沉思、席勒对古希腊完美人性的追慕、弗洛伊德的“原欲”学说、荣格的“原始意象”理论、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学说等无不对人文学界的原始寻根热潮产生影响，历史学家汤因比、美学家海德格尔、科学家爱因斯坦、文学家歌德等对东方文化的仰慕与赞叹更是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感召，促使中国当代的知识精英们把关注的目光重新投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寻根文学”中，始终贯穿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剧烈冲突。它形象而准确地刻画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中的矛盾所在。“寻根”产生了一批优秀之作，却也未能抵达应有的深度和高度，而是草草收场。这就为世纪末民间文化热潮的横空出世、再度出击提供了契机。

1994年，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与《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对“民间”这一概念做了详细的梳理和系统的阐述。从而使得“民间”这一蛰伏已久的审美空间再度跃出历史地表，闪现出耀眼光华。它不仅对作家的“民间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为文学研究者展现出一个长期被遮蔽的文学史空间，为当下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总之，世纪末文坛上涌现出的这一新的文学现象并非缘于作家个人自发或自觉的选择，而是由特定的文化语境及文学自身发展逻辑所规定的。更确切地说，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二者对峙、冲突、较量的结果。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选取和研究角度的切入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葛里耶曾经说过：“每个社会、每个

时代都流行一种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实际上说明了一种秩序，即一种思考和在世界上生活的特殊方式。”^① 90年代文学所表现出的这种新的形态也同样表明了一种秩序，一种当代人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及其把握世界的特殊角度。那么，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针对文坛出现的这一新的文学现象，我们应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呢？在以往的文学批评中，研究者们或通过考证文学与作家的个性、心理的关系来研究文学，即采用心理批评、传记批评；或通过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符号结构，从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或通过对作品中所隐喻的神话原型的阐释和解读，从神话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或通过解构与颠覆男性统治话语、重构女性主体，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更为早远也更为普泛一点的则是从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的角度来研究。童庆炳先生曾指出，我们可以把不同研究视角和方法看作是同一座房子的不同窗户，打开不同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既然作家们的关注对象开始悄然下移，那么，文学研究者也应该视线下移，贴近民间根基。在此，笔者想采用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来对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进行研究。

采用民俗学方法来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并不缺乏先例。在西方，巴赫金文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民间文化、民众意识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在《拉伯雷与果戈理》（1940年）一文中，他指出：“现代文艺学的一个主要不足，在于它企图把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整个文学全纳入官方的框架内。其实，拉伯雷的作品只有放到民间文化的巨流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民间文化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是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并形成了自己看待

① [法] 罗伯·葛里耶：《新小说派研究》，朱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52 页。

世界的独特观点和形象反映世界的独特形式。”^① 在国内，鲁迅、闻一多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拓荒之功。鲁迅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闻一多所作《伏羲考》、《神话与诗·说鱼》均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学术界称这种研究方法为文艺民俗学。日本民俗学家井之口章次曾把文艺民俗学的研究主要概括为三个方向：（1）为了正确理解文学作品，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与社会，为此要借助于民俗学的研究。鲁迅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说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2）用以了解文学素材向文学作品的升华过程。因为在现实性上，文学素材往往就是民间传承。这一方向可说是对文学源流问题的研究与考证。如对《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文学名著是如何由民间传说到文人写定作细致考察。3. 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来研究，也可称之为文献民俗学的方向。^② 目前，我国的文艺民俗学在第三个方向的研究上力量尚显薄弱。而本书恰是从第三个方向即文献民俗学角度入手，来对贾平凹作品中的民俗文化现象作一探讨。

除此之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我们也颇有启示。在人类学界，社会人类学者们常会选取一个社区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个被选取的社区既是大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必然会具有着自己的特质。社会人类学者们总是试图透过这个小社区来窥视大社会，借助于尽可能充分的地方性描述来探讨整个大社会的特征与动因。人类学者马德生称此类方法为“社会缩影”法。^③ 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可视为这一方法的开

① [俄]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白春仁、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② 陈勤建：《民俗学研究评述》，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③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2页。以下不再另注出版社和版本。

创性作品。《江村经济》系费先生的英文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生活》的汉译本，是透过小型社区来窥视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变迁的典型性的实验性范例。费先生曾阐释过自己的意图：“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①毫无疑问，对社会变迁问题的探讨，将会极大地推进人类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应用价值。

人类学界的这一研究方法对我们不无启迪。针对 90 年代以来当代文坛上掀起的民俗文化热，我们也可以尝试选取一个个案来进行研究，“窥一斑而知全豹”，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这一热潮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它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何在？这一“传统的复兴”与我们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否相悖？

在此，笔者想借用文艺民俗学中的“文献民俗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中马德生的“社会缩影”法来对贾平凹的作品进行研究。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中包蕴着极为丰厚的民俗文化资源，这与作者的自觉追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想着眼于考察和研究这里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从民族学和民俗学方面入手”。^②这些民俗文化大部分来源于商州地区和西安的民间社会：“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与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③据此，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对这一社区民俗文化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来探讨中国民间社会的特征及动因，以小见大。事实上，这也是贾平凹创作的初衷所在：“我便产生了这么一个妄想：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

①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北京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9 页。

② 《腊月·正月》后记，《贾平凹文集》第 6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4 页。以下不再另注出版社和版本。

③ 贾平凹：《〈高老庄〉评点本》，肖云儒评点，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57 页。以下不再另注出版社和版本。

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指出：“但我绝不是写的商州与西安，我从来也没承认过我写的就是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商州和西安。……我无论写的什么题材，都是我营构我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才是我的本真。……”^②20世纪90年代以前，贾平凹的创作重心主要放在商州地区，即侧重于表现乡村民俗。90年代后，他渐渐把目光转向都市民俗。《废都》、《白夜》、《土门》等都是这一转向的标志性文本。但假如我们将贾平凹笔下的“都市民俗”与老舍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张爱玲在《传奇》中所表现的“都市民俗”相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二者间巨大的差异。即贾平凹笔下的“都市民俗”大都可以看作是“乡村民俗”的迁移与变形，只不过转换了一下地点且略微变换了一下形式而已。因此，本书将侧重于研究贾平凹作品中所涉及的乡村民俗，对于《废都》、《白夜》、《土门》中表现到的民俗文化我们也将其纳入到乡村民俗的框架中来讨论。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③它包括了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民间信仰、民间科学技术、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艺术、民间游戏娱乐等诸多内容。“民俗”一词在中国早已有之。《礼记·缙衣》中载：“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汉书·董仲舒传》中载：“变民

① 《腊月·正月》后记，《贾平凹文集》第6卷，第123—124页。

② 《〈高老庄〉评点本》，肖云儒评点，第357页。

③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风，化民俗”等等。但“民俗”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建立起来却是源自西方。1846年英国学者W. J. 汤姆斯正式提出“民俗学”(folk-lore)一词，标志着民俗学学科的正式建立。

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概念非常接近。二者涉及的主体都是中下层民众，尤以农业文明背景下的乡村文化为主要内容。二者所反映的对象也大致相同，包括饮食、民居建筑、民间信仰、服饰、人生礼仪、民谣、歌舞等。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就倾向于将二者等同：“从30年代起，我就注意到广大民众自己所创造、享用和继承的文化，并且创用了‘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我曾经为一个教育刊物编辑了‘民间风俗文化专号’。计划刊行过一系列的民间文化丛书。我甚至拟用这个名词去代替‘民俗’一词，而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化学’。现在考虑起来，当时那想法是合适的。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① 从他对传统文化的分类中我们也可看到这一倾向。在他的《民俗文化学发凡》一文中，他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分为三条主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的干流，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干流是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② 其中，中下层文化显而易见也就是民间文化。在本书中，我们采纳钟敬文先生的学术观点，忽略二者之间的些微差异。

民俗文化自古以来就与文学艺术保持着琴瑟和谐的良好关系。民间世界的丰富、芜杂成为艺术发展的沃土，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可在民间世界中找寻到其渊源，民俗与文学之间更是两相契

①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自序》，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②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5期。